

## 《塔拉斯·布尔巴》：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冲突

——当代视阈下的果戈理作品解读

孙 婷

(西安石油大学 710065)

**提 要：**本文从“读者接受”的视角，从阅读条件和当下语境对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进行解读，阐述作家的创作主旨：思考如何解决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突问题。在结合当下语境，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对文本情节、人物塑造中所蕴含的深刻含义进行深入挖掘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果戈理不主张采用极端防御性战略和以暴抗暴的方式解决文化间的冲突和对抗，而主张吸纳西方文化的精髓，发挥本土文化优势，以团契精神为主导在相互尊重和对话的基础上，营造自由、平等、和平的全球社群。

**关键词：**塔拉斯·布尔巴；本土文化；异域文化；冲突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 0 引言

著名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称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为“一部妙不可言的史诗，是一个率真的民族英雄生活的真实写照，有限篇幅里描写了宏伟壮观的场面，可堪称为荷马史诗”。(B.B.Голубкова 1954: 235)小说的主人公塔拉斯·布尔巴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弘扬民族正气、捍卫民族尊严、维护民族独立的英雄。苏联时期，这部小说作为爱国主义教材被列入中小学课本里。在卫国战争时期，塔拉斯·布尔巴的英雄行为鼓舞了战士的斗志，振奋了人心，小说成为“激励战士们前赴后继，奋勇抵抗德国法西斯入侵者的不朽的经典之作”。(B.B.Голубкова 1954: 235)苏联解体之后，人们对塔拉斯的行为有了不同的认定。有人认为，塔拉斯是带有悲剧色彩的爱国者，狂热的基督教徒；也有人认为，他是种族歧视者、残酷无情的恐怖分子和弑子者。2002年《文学报》就中小学教材是否需要保留《塔拉斯·布尔巴》展开了讨论，一些教育工作者认为应该保留该小说，弘扬传统的民族英雄精神，一些人则认为，该小说不宜中学生的阅读，并“谴责那些屈从于传统依然用这部小说教育孩子的教育工作者们”。<sup>2</sup>在纪念果戈理诞生200周年之时，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塔拉斯·布尔巴》，于2009年4月1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时上映，影片的公映掀起了一股对该小说解读的新浪潮。“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和观众以新视角对小说主人公进行了解读。

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说“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布鲁姆 2009: 402)文学经典引导读者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其艺术生命经读者的不断解读才得以延续。《塔拉斯·布尔巴》就是这样的一部经典之作，它所引发的思考不仅仅是在当前语境下如何认定塔拉斯·布尔巴的行为，也是对文本中蕴涵的文化间性问题的挖掘。伴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西方文化作为主流文化不断消解非主流文化的个性，非主流文化的文化自性逐渐

迷失, 西方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文化间性也日趋紧张。《塔拉斯·布尔巴》则以流血和死亡印证了 19 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界就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 斯拉夫本土文化抵御、对抗西方文化。在 21 世纪, 这种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间的冲突和对抗依然存在。因此, 在当代语境下重新解读小说的寓意, 将对如何解决文化间的冲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1 阅读条件和当下语境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 以联邦德国的汉斯·罗伯斯·尧斯和沃尔夫冈·伊泽尔等为首的康斯坦茨学派挑战传统文学批评理论, 提出“读者接受理论”。尧斯认为文学作品不是超时空的既定的客观存在, 作品的“历史生命”与社会时代、读者密切相关。“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独立自主的、对每个时代的每一位读者都提供同样图景的客体。它并不是一尊文碑独立式地展示自身的超时代本质, 而更象一本管弦乐谱, 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起新的回响, 并使作品文本从语词材料中解放出来, 赋予它以现实的存在”。(汉斯·罗伯斯·尧斯 1989: 2) 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就依赖于不同时代读者的期待阈与作品意象相吻合的程度。文学作品中的“不确定性和空白”造就了文本的“召唤结构”, 读者与作品之间形成一种非对称的对话。第一文本(即作品)能否转化为第二文本, 则取决于读者的接受行为和接受程度, 而读者的文学接受又依赖于一定历史空间和社会空间。读者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与作品的解读、接受间形成了一个双向互动的作用场。正如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的, 作家在创作一部作品时, 其行为“只不过是一个不完备的、抽象的瞬间”, 而读者在阅读文本时, 其行为是一项创造性延展作者设定的图景。“写作, 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萨特 2009: 180) 对于读者如何创造性解读文本, 伊泽尔提出了空白填补说。文本中的空白使文本中各角度——叙述者、人物、情节与虚设读者间的联系处于开放状态, 促使读者协调这些角度。读者通过主题-背景结构转换、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对话等填补文本中的空白。

自新大陆发现以来, 西方文化一直处于霸权地位, 企图以主流文化的身份强行消解其它地区文化的个性。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强制性推行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借助以发达国家为权力中心的世界经济和城市世俗文化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和文化观念。20 世纪后期, 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西方文化价值成为普遍价值被世人接受, 世界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西方文化以其暴风骤雨般的融摄力量横扫世界, 独霸话语权, 实施文化霸权策略, 推行以排斥性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 那些属于非西方轴心文明的国家和民族采取了两个极端策略: 一个是“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 另一个极端是奉行保守主义, 试图用防御性策略保护本土文化意识形态的纯洁性, 保持自身文化个性和谋求生存发展空间。几个世纪以来, 本土文化与西方异域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从未间断。

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潜在的核战争威胁、剑拔弩张的国际关系、血腥的暴力冲突、宗教信仰的不同等一系列问题, 迫使人们反思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 并意识到西方轴心文明极力推行的物质主义、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丰富舒适的物质生活, 同时也使人类陷入了生存危机: 地球生态环境毁灭性的破坏、现代精神文明深度的丧失、人类文化的同质化以及各民族文化间的冲突。面对这种境况, 人们开始质疑以启蒙思想为核心, 强调个人主义、自由和理性、自我中心一元论的西方文化。随着二分语境的结束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伴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 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多元现代性的全球村, 在这里各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将得到承认和尊重, 并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间的沟通、了解和对话, 从而谋求各民族文化的共生和发展。为了谋求这种和谐、共生的全球社群关系, 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间的关系便显得尤为重要。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恰好给当代读者提供了这样的阅读条件, 它向读者发

出了阅读召唤，预示了如何解决本土与异域文化间的冲突的问题，如何构建一个平等、多元的全球社群。因此，本文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结合当下语境，重新解读《塔拉斯·布尔巴》，从小说的情节、人物塑造中解读蕴含的深刻含义。

## 2 作者视域中的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突

18世纪，伴随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西方启蒙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俄罗斯。启蒙思想犹如一把双刃利剑，抨击专制农奴制度，同时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唯理主义、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侵蚀了俄罗斯传统的道德精神，使得俄罗斯上层社会精神匮乏，物欲横流。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知识界的精英们就俄国历史和未来发展道路、俄国和西方等问题展开讨论，在激烈的争论中诞生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代表本土的斯拉夫派和崇高异域的西方派之间的论争成为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社会哲学思想的焦点。当时，生活在欧洲的果戈理虽然置身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斗争之外，但却心系俄罗斯命运。在斯拉夫文化和西方文化冲突问题上，他的思想更倾向于斯拉夫派，这体现在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的创作中。果戈理“站在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用西方人看不到的方式看到西方文化”，（威廉·巴雷特 2004：133）他用斯拉夫特有的兄弟般的集体主义和建立在东正教宗教信仰和道德自我约束基础上的社群同盟强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启蒙思想的核心——“‘原子式’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突出抗衡与制约关系的民主主义”。（杜维明 2003：162）在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果戈理淡化历史背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16世纪作为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描述17世纪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主人公塔拉斯和其他人物形象。由于人物原型取材于无法考据的乌克兰民歌和传说，文本中大量篇幅描述的杜勃诺之战也无史料记载，所有这一切令读者难以认同《塔拉斯·布尔巴》是一部纯粹的历史性小说，同时引发读者思考：为什么作者放弃创作一部讲述俄罗斯历史的大部头小说？而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研究再版的《塔拉斯·布尔巴》和第一版的区别。1835年版的小说共9章，塔拉斯被塑造造成一位蛮性十足、骁勇善战的查波罗什哥萨克，为了抢夺战利品，他与昔日的战友发生争执。1842年版，小说共12章，不但塔拉斯的形象高大、无私、愈加丰满，而且增加了对查波罗什哥萨克社群的描写，添加了歌颂俄罗斯的句段。“在第二版中表现了果戈理的宗教政治乌托邦，——在第一版中表现了果戈理的青春年少和对乌克兰的挚爱，——在痛苦地思索乌克兰（小俄罗斯）和俄罗斯命运过程中，他完成了第二版的创作。”<sup>1</sup>此外，果戈理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奇怪的事情是我身在俄国却几乎看不到俄国。我遇见的所有俄国人多半喜欢谈论在欧洲而不是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果戈理 1999：314）

在19世纪30-40年代俄罗斯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思想敏锐的果戈理决然放弃了历史小说的创作，改为创作一部西方文化与斯拉夫文化冲突的史诗之作——《塔拉斯·布尔巴》。果戈理用俄语讲述发生在乌克兰的故事，借历史题材，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思考如何在西方文化与斯拉夫文化冲突中探求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成为他创作的主旨。小说中残酷的屠杀和血腥的战争场面揭示了西方文化与斯拉夫文化间的紧张对立和激烈冲突，在刀光血影的厮杀中却寓意着果戈理创作主旨：借助乌克兰历史，讲述斯拉夫文化与西方异域文化间的冲突，指明一元文化中心论是造成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指出极端防御性战略和以暴抗暴的方式不但无法根本解决文化间的冲突和对抗，还会导致本土文化的终结；此外，暗示斯拉夫文化应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精髓，发挥本土文化优势，以团契精神为主导在俄国和西方间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谐无冲突的兄弟盟友关系。

## 3 当下读者视域中的《塔拉斯·布尔巴》

当代德国哲学家、哲学诠释学创始人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中说“理解是被理解东西的存在”。作品的存在离不开读者的阅读理解，文本是介于作品与读者间的中性客体，它是需要读者进行解释的对象。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通

过情节、人物展示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在当今语境下仍然存在，如何解决冲突的问题，小说已给读者提供了解决的方法。因此，结合当下语境，挖掘情节、人物中所蕴含的意义，无疑是对果戈理研究进行的一次补白。

小说借助情节和人物表现西方文化与俄国文化的差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主义和团契精神间的对抗冲突，试图在文化对抗中寻找解决冲突的出路。小说故事情节简单，按塔拉斯父子三人的相聚-离家-征战-死亡的顺序发展：塔拉斯为了让儿子奥斯塔普和安德烈接受斯拉夫精神文化熏陶和哥萨克式刀光血影生活的历练，他从慈爱、温柔又软弱的母亲身边强行将儿子带到索契。在这个没有压力、不靠社会契约维系的社群同盟里，奥斯塔普和安德烈迅速地成长为强悍的勇士和崇尚自由的查波罗什哥萨克。为了捍卫东正教，抵制天主教的扩张，查波罗什哥萨克决定报复波兰人的掠夺和凌辱性行为，以塔拉斯等人为首的哥萨克军队横扫波兰，曾令波兰人闻风丧胆。因个人情爱和对西方美好事物的向往，幼子安德烈放弃追随父亲的人生轨迹，放弃查波罗什哥萨克人的信仰，投身于波兰人，于是他掉转马头挥刀砍向昔日的战友、兄弟和父亲。塔拉斯满怀愤怒和鄙视，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小儿子。为了给长子复仇，塔拉斯召集自己的队伍对波兰人实行了更加残酷的袭击、屠杀。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势单力薄的塔拉斯被波兰人俘获后烧死。

法国哲学诠释学派奠基人保罗·利科曾说过“理解一段文本不是去发现包含在文本中的呆滞的意义，而是去揭露由文本所揭示的存在的可能性”。（保罗·利科 2001：424）为了引发读者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想象力，果戈理采用嵌入式叙事法和一波三折的复杂手法处理情节，表现出西方文化与斯拉夫文化间的对立冲突。在塔拉斯父子三人离家赶赴索契的途中，作家采用了嵌入式叙事法描写了基辅神学校的生活，一则为了表现代表斯拉夫文化的哥萨克人与代表西方主流文化贵族间的对立，“他们不准踏入由波兰和俄罗斯贵族构成的上流社会，……还下令要对他们严加管教”；（果戈理 2002：39）二则，为了塑造安德烈和奥斯塔普两个人物形象，对比兄弟两人的性格特征，在描写杜勃诺城战役的场景中，为了刻画查波罗什哥萨克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强调斯拉夫文化与异域文化间的不断冲突，果戈理再次使用嵌入式叙事法，三言两语简单介绍了巴拉班营长和莫西·希洛征战士耳其的经历。而在讲述查波罗什哥萨克西征时作家采用一波三折——出其不意法处理故事情节。当查波罗什人撕毁与苏丹签订的和平协定，准备抢劫土耳其人时，突然间一群战败的哥萨克带来了令人震惊愤怒的消息——波兰人强制推行教会合并，瞬间查波罗什人决定挥师西进，为捍卫东正教信仰而战。杜勃诺城之战，查波罗什人胜利在望，可是索契遭鞑靼人洗劫的消息却使他们刹那间做出兵分两路的决策。这些跌宕起伏和错落有致的情节吸引读者融入文本情境中，不断填补空白，完成审美阅读，展示其蕴含的意义：15—17 世纪的乌克兰是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突中心。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即北接俄罗斯，南临土耳其，东临鞑靼，西接波兰，加上缺乏天然屏障，几个世纪来乌克兰一直处于异域文化交流的中心，此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流血杀戮性异域文化入侵和本土文化的抵御，“那时候，整个半开化的南部俄罗斯已经被本国的王公贵族们放弃，屡屡遭到剽悍的蒙古入侵者的进犯，以致弄得十室九空，一片焦土”，遍布渡口河岸的哥萨克“是体现出俄罗斯力量的一种非凡的现象：它是由灾难的火镰从人民的胸怀中击发出来的”。（果戈理 2002：31—32）第聂伯河的查波罗什哥萨克，作为斯拉夫文化的一个族群更是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和对抗发挥到极致。剽悍尚武的查波罗什哥萨克本身就是西方文化与斯拉夫文化、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互碰撞和冲突的过程中形成，是具有特殊文化认同模式的族群。他们遵循“神-人”契约，以上帝和圣书的名义抵御、征讨、掠夺异教徒的波兰人、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对他们而言战争不仅是获得个人荣誉，更是捞取战利品的手段。布尔巴正房里陈列着威尼斯和土耳其产的彩色玻璃瓶，精美的银杯和镀金的酒杯足以说明塔拉斯主张征战的原因。虽然，文本中查波罗什哥萨克进攻波兰是为了维护东正教，反对波兰政府以暴力手段推行教会合并，可是他们针对无辜的犹太人和波兰平民实施疯狂又残忍的复仇。这种“英雄行为”不禁令人联想到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制

造的袭击事件。为什么具有人文情怀的果戈理没意识到自己笔下的民族英雄是嗜血的复仇者？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发掘一下作品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寓意。

塔拉斯是位尚武好战的老团长，他奉行宗法制，信守东正教的“神-人”契约，并以合法的东正教捍卫者自居。他规定“在以下情况下必须拔刀相向，即如果波兰收税人不尊重哥萨克的首领，在后者面前不脱下帽子；如果有人嘲弄正教，不遵守祖先的规矩；最后，如果敌人是异教徒和土耳其佬”。（果戈理 2002：33）虽然塔拉斯了解西方文化的精髓，享受着西方文化的物质，却并不打算从精神上接受和认同它，他的内心深处抵触西方文化。小说第一个场景中这位曾经迫使儿子们接受波兰式教育的人，对学成而归的儿子们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致使父子间发生了拳脚功夫的较量。这种超越血缘关系的较量奠定了小说的基调：本土文化与西方异域文化的较量。日常家庭生活中，脾气粗野的塔拉斯是位极其固执的丈夫和父亲。为了马刀、战友和欢聚畅饮，他和妻儿聚少离多；心情不畅时，会动手殴打妻子；为了让儿子们接受地道的哥萨克教育，塔拉斯不顾妻子的苦苦哀求，在孩子们到家后的第二天便将他们从慈母身边拖走。尽管奥斯塔普和安德烈同为塔拉斯的儿子，但他对待兄弟俩的态度截然相反：他鄙视、痛恨幼子的背叛，射杀幼子；敬重、拯救长子，痛惜长子的牺牲。塔拉斯对待两个儿子的不同态度，不仅突出了本土文化与西方异域文化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而且阐述了塔拉斯的文化主张：以斯拉夫文化为中心，防御性抵抗西方异域文化的入侵。采取以暴抗暴的方式解决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间的冲突。

大儿子奥斯塔普心地善良、为人坦率、性格刚烈、沉着冷静、果断勇敢，具有“哥萨克所特有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 出卖伙伴”，而且“他对任何诱惑都无动于衷”。（果戈理 2002：40）更重要的是，奥斯塔普具备以包容之心，兼容性吸纳西方异域文化，批判性接受西方异域文化精髓和发扬斯拉夫优良传统文化的特质。奥斯塔普虽然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然而他在战场上克服、战胜一切危险，“转瞬间便判断出形势的危险程度和发展趋势，并能够当即想出避开危险的办法”，（果戈理 2002：69）却得利于他在索契接受的训练和俄国的传统教育。奥斯塔普摆脱了粗野蛮化的习俗，以俄罗斯特有的人文价值观和理性思维思考一切，他不满父亲的弑子行为，并怜悯弟弟。小儿子安德烈机灵、骁勇、粗犷、血气方刚，但精神世界成熟，情感丰富、细腻。“性格要活泼一点，感情也似乎要丰富一点。——乐于学习，比哥哥机灵。”（果戈理 2002：40）安德烈身上体现出个性与共性的矛盾。安德烈像所有的哥萨克一样，在战场上骁勇善战，渴望建功立业，他挥舞着马刀奔向敌人，沉浸在由枪弹、刀剑和哀嚎声组成的音乐中。在日常生活中，他又是个好享受、敏感性情中人。在天主教教堂里，他感受西方文化的美丽和奇妙，沉浸在绚丽光影、缭绕轻烟的情爱追求中。安德烈背叛了祖国和自己的信仰，完全抛弃了斯拉夫文化，全盘接受了西方文化。奥斯塔普和安德烈虽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却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归属。面对强大西方异域文化的融摄力量，曾经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两兄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待西方文化。从文化认同和归属层面上讲，奥斯塔普继承了塔拉斯的衣钵，并倾向于以暴力方式解决文化冲突问题。弟弟彻底摒弃斯拉夫文化，全盘西化，而哥哥则为捍卫斯拉夫文化而牺牲生命。

军旅战争生活中，性格粗犷豪放的塔拉斯，十分珍惜兄弟战友间的情义，珍视盟友之义。他曾为逝去的老战友潸然泪下，为鼓舞士气散尽珍藏多年的美酒。他关心战友，战场上冒着敌人的炮火三次询问士兵的装备、战斗力情况。塔拉斯判断亲疏远近或敌友的标准是民族、信仰和文化异同，而不是血缘关系。他可以挽救被狂暴的查波罗什哥萨克抛入第聂伯河的一个陌生犹太人——扬克尔，因为他救过自己的哥哥，却又亲手射杀自己的幼子，对天主教教徒和波兰平民大肆屠杀，“在大街上用长矛把她们（波兰妇女）的婴儿挑起，扔到烈火中连同她们一起烧死。”（果戈理 2002：155）他以斯拉夫文化捍卫者的身份采取极端暴力方式对待西方异域文化的入侵。塔拉斯将对兄长的尊敬和爱转移到犹太人扬克尔身上，心生怜悯之情。当看到狂热的安德烈挥舞着军刀，乱劈乱砍哥萨克人，听到“对我哥哥说，对哥萨克

们说，对查波罗什人说，对所有人说，现在父亲不是我的父亲了，哥哥不是我的哥哥了，伙伴不是我的伙伴了，我要跟他们全体开仗”（果戈理 2002：98）时，父子血缘关系已上升到文化认同层面。父子间的血缘关系隐退，取而代之的则是不同文化的归属，即两个敌对的阵营——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塔拉斯对西方文化的仇恨自然地转嫁到幼子身上，于是，为了惩罚安德烈的精神背叛，更是为了维护本土文化的纯洁性，塔拉斯将仇恨的子弹射入安德烈的心脏。

塔拉斯这一人物也代表了以东正教信仰为基石、聚合性社群为社会单位、崇尚心灵自由的斯拉夫文化。通过对比塔拉斯对待儿子、伙伴、战友和波兰人的不同态度，读者可以想象斯拉夫本土文化与西方异域文化间的激烈冲突；通过分析塔拉斯这一人物形象，读者可以把握 19 世纪俄罗斯斯拉夫派的文化主张；通过分析塔拉斯父子三人的人物命运，可以发现作家虽然倾向于斯拉夫派，但并不完全赞同其主张，这蕴涵在父子三人的死亡意象中。文本中安德烈的死亡被喻为割下的沉甸甸的麦穗，斯拉夫文化中收割的麦穗象征着献祭般的牺牲。这一死亡意象寓意着背弃本土文化，全盘西化的安德烈是斯拉夫文化与西方文化间对抗冲突的绝对牺牲品，暗喻着全盘西化策略根本行不通；塔拉斯的自杀式死亡暗喻着，坚持一元文化中心论，主张以防御性战略对待西方异域文化，运用暴力方式解决文化间冲突，这种方式不仅会导致自身走向终结，而且消解了本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精髓，提高自身竞争实力的机会。长子奥斯塔普的死暗示，以暴抗暴解决文化冲突的方式会扼杀有能力吸纳西方文化精髓、发扬斯拉夫文化、能在文化对话中为本土文化争取到更大生存空间的文化继承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命运的安排中蕴藏着作家的观点：一元文化中心论是造成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反对极端防御性战略和以暴抗暴的方式解决文化间的冲突和对抗。

斯拉夫文化特有的团契精神是俄罗斯人民的文化基因。战场上，塔拉斯发表的感人肺腑的战前演说是对团契精神的高度概括：查波罗什哥萨克人“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血缘上牢固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即“盟友之义”最神圣，（果戈理 2002：118）而这种团契精神又体现在对索契日常生活的详细描述中。第二版中作家增加了大量的篇幅描写索契的社会生活、习俗和统领的选举过程，为读者绘制了一幅和谐团结的理想社群蓝图。文本中战败后的塔拉斯发出“倒不如别举行宴会（俄罗斯史诗中常用宴会暗喻惨烈的战役）还好一点”的感慨把读者的思绪带回到西征前的索契：东正教的信仰将四面八方的查波罗什哥萨克聚集在索契，日日的欢宴狂饮，吸引着每个豪放不羁的哥萨克；在“自由不羁的风气”里，粗狂的哥萨克却自觉遵守“简单明白的管理规则”（果戈理 2002：51）和执行严格的惩罚制度，尤其是对杀人犯实施活埋的处置；在这个由几十间营房组成的自由自在的共和国里，集会上统领和长官们向哥萨克鞠躬致礼，听从人民意愿；在索契遵循“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的“神一人”契约，而不是强调人权、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契约；统领选举时，平民哥萨克与长官间的民主对话机制更是彰显了平等对话的魅力。在这些详细具体的描述中，蕴藏着作家对团契的精神定义，即建立在东正教信仰上的斯拉夫特有的兄弟般的集体主义和盟友关系。索契正是这样一个信守斯拉夫集体主义的社群同盟。在索契社群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个人权力由集体赋予，并服从于集体意志，在民主选举统领的场景中哥萨克人高呼：“放下权杖！鬼儿子，马上把权杖放下来！我们再也不选你了”；（果戈理 2002：54）每个人享受道德自由，在共同的信仰中充分张扬个性，在遵守社群道德习俗的基础上保留独立的自我；人们远离压力集团，免除社会契约，信守“神一人”契约，依赖民族习俗或道德约束维持本民族文化，彼此信任、互相尊重。作家笔下的索契团契不仅是凝聚查波罗什哥萨克人的精神纽带和精神家园，也是俄罗斯人民感情中聚合性的社会实体，是斯拉夫文化新的“诺亚方舟”。在塑造索契团契形象的同时，果戈理也构建了理想的全球社群模式，试图推广斯拉夫文化经验，意在为解决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间的对抗冲突提供一种思路，为建立自由、和平、平等的全球社群指明一条途径。

## 4 结语

精通俄罗斯历史和乌克兰历史的果戈理创作《塔拉斯·布尔巴》不仅仅是要借历史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唤醒俄罗斯的民族意识,而是借史喻今,启人深思如何解决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间的冲突问题。作家虽未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将自己的思想隐藏于人物与情节的空白中,作品中塔拉斯父子三人死亡的意象和索契团契形象的塑造表明:一元文化中心论必然导致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间的对抗和冲突,若采用极端防御性战略抵御异域文化入侵,通过以暴抗暴的方式解决文化间的冲突,其结局将是本土文化的终结。面对两种文化碰触和对抗,作者认为应该坚守本土文化,有鉴别地吸收外来异域文化,取长补短,发挥本土文化的优势,信守“神-人”契约,发扬团契精神,在相互尊重和对话的基础上营造自由、和平、平等的全球社群。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间的对抗日益突出,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为解决文化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途径,绘制了全球社群相安和谐的图景。从这个层面上讲,该作品可谓“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之作。

## 附注

1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после юбилея [J]// Нева. 2009, № 9 <http://bagazines.russ.ru/neva/2009/9>

2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 Изучать ли в школе “Тарас Бульбу”[N]// Литература, 10 октября 2002г.  
<http://lit.lseptember.ru/2002/09/10.htm>

## 参考文献

- [1]Голубкова В.В. Гоголь в школе [C]. Москва: Изд.Академи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РСФСР, 1954.
- [2]保罗·利科尔. 诠释学的任务[A]// 理解与解释(洪汉鼎主编)[C].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 [3]布鲁姆. 经典悲歌[A]// 文艺学-基础文献宣读(徐岱 沈语冰选编)[C].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 [4]杜维明. 儒家人文精神与宗教研究[A]// 理性主义及其限制[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5]果戈理. 与友人书简选(任光宣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 [6]果戈理. 塔拉斯·布尔巴(冯玉律译)// 果戈理全集(沈念驹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7]汉斯·罗伯斯·姚斯. 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A]// 接受理论(张廷琛编)[C].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9.
- [8]萨特. 为什么写作?[A]// 文艺学-基础文献宣读(徐岱 沈语冰选编)[C].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 [9]威廉·巴雷特. 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Taras Bulba: Indigenous Culture Conflicting with Allopatric Cultures**

——An Interpretation of Nikolai Gogol Works from Contemporary View

SUN Ting

(Xi'an Shiyou University, 710065)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Nikolai Gogol's novelette *Taras Bulba* from the viewpoint of readers' acceptance in two aspects, reading conditions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 for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ing

the creative aim of the author, which is to deliberate in his work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eal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indigenous culture and the allopatric cultures. Integrating with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and excavating the profound meanings embodied in plots and figures from the readers' acceptance view, this paper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Gogol didn't propose extreme defensive strategy of answering violence with violence in solving cultural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s, however, he stood for absorbing the western cultural essence and expressing local cultural advantages to establish a global community of freedom, equality and peace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nd dialogs in the leading spirit of fellowship and communion.

**Key words:** Taras Bulba; the indigenous culture; the allopatric cultures; conflict

**作者简介:** 孙婷 (1972—), 西安石油大学外语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俄苏文学。

**收稿日期:** 2011-05-03

**[责任编辑: 刘 锐]**